



这个是人均 GDP 的分布。但是按人口的分布，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经济分布情形，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平衡发展，有发展梯度的地方。也说明它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拥有稳定、和谐的环境，增长，再增长 15 年，20 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国增长的潜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谢谢大家！

○座長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次にルー・ディン先生、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テーマは、「調和ある地域開発：挑戦と選択」です。

「調和ある地域開発：挑戦と選択」 ルー・ディン（フレーザーバレー大学）

谢谢主席先生！很高兴有机会来向大家汇报我的一些的研究的心得。我的今天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和谐问题。大家都知道，吴教授讲中国有四个世界，区域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非常高速，但是区域之间的收入格差呈现一个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和谐的课题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的研究主要研究是看区域收入格差演化的趋势还有格差的原因，以及一些政策的选项。如果看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话可以看到，东部跟西部地区的收入差异是在扩大之中。

那么最近十多年以来，97-07 年数据来看，这个实线是从最低的贵州到最高的上海，这样一个排列，这样一个收入的差别，黑色的实线是 1997 年的情况，白色的点是 2007 年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格局没有什么变化，这么这个红线是一个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人均产出来讲，2007 年对 1997 年比例是 232%，它的均值增加了那么多，另外它的离散系数也就是用来衡量区域之间的格差程度的一个系数，这个是增加了 108%。但是这里面如果分别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来看，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差异格差扩大的是比较明显，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格差扩大的就比较不那么多，所以主要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来自农村居民的差异。然后让我们把人均地区的产出系数，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系数跟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系数加以对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条是农村的差异系数，把 2007 年的情况和 1997 年相比，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改善。接下来稍微讲一下理论分析。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讲，如果在技术条件一样的情况

下，各地的人均收入有一种趋同的趋势。那就是人均收入主要是取决于储蓄率和人口的增长率。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些有关趋同假设的实证检验研究。所谓收入趋同的基本机制一个是技术的扩散，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另外一个产品贸易及要素的流动。从技术扩散来讲，刚才吴教授讲的模仿、追赶，满足了这个模型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后来者有很多后发的学习优势，可以模仿的优势。第二部分的机制是来自人口经济学家经常讲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取决于人口结构变化，一般是通过三个阶段，就是所谓人口结构的转型，从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一个高死亡率、低出生率，最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出现一个人口的负担水平下降，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整个人口的增长速度的阶段，使得储蓄率上升，造成一个非常有利的资本积累的条件。人口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窗口。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会有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第三类的机制，主要就是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从经济理论来讲，它包括工资和资本的收益，可以通过产品贸易的渠道来实现均等化，也可以通过要素流动来达到这个均等化，这是使各地的收入、人均收入趋同的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要素流动里面，劳动力的流动是特别重要。因为一方面有一个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效应，这是两位学者Razin和Yuen提出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资本所有者往往不随着资本流动，而人、劳动力流动就会引发移民，那么会更有助于人均产生和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就是说中国的区域的格差是有这样一个系数，是用最高的这条曲线来表示的，可以看出，10多年来，95年来到2007年来，是稍有一些上升的趋势，中间有一些波动。形成这个格差系数的来源，主要是就业者人均资本存量的格差，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格差。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没有前两者那么重要，但是它可以解释各个省级经济间的人均收入格差1/10的不同。另外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估计，各个省级经济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可以看到这实线是一条各省级人均收入的一个系数，右边收入很高的是富裕省份，左边收入很低的是穷的省份，我们看到富裕省份基本上是劳动力的净流入，穷的省份劳动力大部分是净流出。基本上是这样流动的格局。再让我们看劳动力和资

本流动的和它们的要素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来，从1990年代中到2007年的相关关系是有一些变化的。总的来看相关关系还是比较弱的。在大部分年份，要素流动的和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关系是正的，就是说它们流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正相关不是很强。而且劳动力流动对工资的均等化在2000年以后显著的改善，这主要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中国放松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还有资本均等化的作用呈现了一个U型的变化，两者间比较低的部分可能就是由于西部大开发这个作用。接下来，讨论一下所谓中国的人口红利，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负担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一直是急剧下降，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窗口。但是到了现在，就到了一个拐点，已经到了底部，接下来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负担比例又将上升，人口老化明显呈现。这里面我们看到穷困的省份和富裕的省份就有不同的情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富裕省份的老化比较严重，穷困省份的人口比较年轻，而少儿的负担比例也比较重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贫困省份的人口结构演变，就是那个人口红利有一个滞后的效应，有利于它们的追赶。不过根据我做的一些比较分析，发现在最近的这些年间，在中国放宽了人口的流动，农民工的流动增加以后，虽然各个省份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都在下降，但富裕省份下降比较慢，而穷困省份下降比较多。老龄人口的比重各个省份都在增加，但是富裕省份上升得比较慢，穷困省成倍的上升，比较快。这是富裕省份和穷困省份的比较，这个是贵州和上海的比较。总的来讲，就是说穷困地区其实在失去它们的人口红利。当然，我们要注意，其实劳动流动有很多的好处，这个首先对工资率有一个均等化的趋势，有这样福利的效应，既有利于劳动者本身，也有利于整个产品成本的下降。它也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积极的效应，对于打工者，留在故乡的人都有一种影响，汇款对家乡的收入都有好处。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劳动力净流出的穷困地区是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如何趋其益而避其害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1亿5000万的农民工里面，有六百万是流动的儿童，是和父母一起流出来，但是还有很多，22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就是很多留守儿童和老人使得穷困地区的人口结构其实是在恶化。对农民工来讲，他们生命周期当中最有生产力的时间是在为他乡服务，最后他们老了以后是

回到故乡叶落归根。所以劳动力长期流动效应对各省份的福利效应，我想主要是取决于移民的类型。如果是农民工能够形成移民，成为富裕地区的城市居民，对贫困地区更有好处。所以对贫困地区来讲，它们的策略应该包括游说推动全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另外也应该推动推进本地的农地改革，降低农民工进城（城市化）成为城市居民的障碍。另外它们也应该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更多的吸引资本的

流入，贫困地区也可以跟发达省市达成移民的意向和协议，这样也可以增大移民对它们的福利效应，这是有关我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谢谢。

○座長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巖善平先生、お願いします。テーマは「新しい局面を迎えた中国の『三農問題』」です。

「新しい局面を迎えた中国の『三農問題』」 巖善平（桃山学院大学）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準備の間に、少し話を始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お手元の資料には「新しい局面を迎えた中国の『三農問題』」となっていますが、時間の関係もありまして、詳しく展開することはしません。ただいまルー・ディン先生のお話をお聞きしますと、私も似たような話を扱っております。人口移動、格差等々を扱っていますが、本日の話は全体のテーマとも関係します「和谐社会」です。農村から見てどのようなことなのか、少し私の考え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昨日、何人かの先生方から話がありましたように、「和諧」という中国語を分解してみますと、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和」は、ご飯を食べることです。口に入ることです。これがしっかりとできていれば、世の中は 和和气气，没什么大问题。「諧」は、皆が言うこと、言いたいことが言えるような世の中で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ですから、しっかりと食べて、文句があればしっかり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な社会になれば、これは「和谐社会」だ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その意味から、今の中国はど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経済改革の深化で食糧問題はほぼ解決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しかし、政治改革の遅れによって民主化改革はいまだに途中です。かなり中途半端な状況にあるとみています。その意味で、今の中国は「和而不諧」です。ごく一部では衣食が不足していますが、ご飯をしっかりと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しかし、非常に安定な社会なのかというと、実にさまざまな問題が潜んでい

るわけです。

今、私が説明したのが趣旨です。それを裏付けるために少しデータを見ていただきながら話を進めたいと思います。

「和」とは食糧問題と見ています。私は農業経済を専門としておりまして、食糧、農業の話もずいぶん扱ってきました。今、説明した中国の「和」は、食糧または飯の問題は基本的に解決されていることは、このグラフからもわかります。大豆の自給率は近年急激に下がっていますが、米、小麦、トウモロコシといった主な穀物は全体として余っています。全体の自給率は、常に 95%以上です。

中国に行かれた経験のある方はおわかりのように、食糧・食物はかなり豊富です。その意味では、中国では「和」という問題は、基本的に解決されているとみています。

しかし他方では、先ほどのルー・ディン先生の話に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格差というもの中国の社会に横たわっています。都市農村格差、地域間格差、所得階層間格差、さまざまなかたちがあります。ここで、経済成長率、都市住民の所得増加率、農民の純収入増加率を見てみますと、改革開放初期を除いて 1980 年代後半以降は、ほとんどの年次において農民の収入増加のスピードが、明らかに都市住民と経済全体の成長スピードを下回っています。

2003 年から胡錦濤・温家宝政権が発足しました。その後、このグラフのように、農民の所得は